



墓葬出土堆塑瓶(罐)类明器功用研究



臧天杰

(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

摘要: 本文以汉代至明代墓葬出土堆塑瓶(罐)类明器为研究对象,它们在制作技术与基本功用上的一致性是可以进行研究的基础。堆塑瓶(罐)类明器在墓葬中的基本功用为储存物品随葬,在此基础上逐渐显现出引魂升天、保佑后人、镇墓护魂等多元功用,并体现出与当时社会的丧葬习俗、民间信仰紧密结合的趋势。

关键词: 堆塑瓶(罐),明器,功用

Abstract: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is the funerary objects in the form of molding jars, which were discovered in the tombs from Han Dynasty to Ming Dynasty. The consistency of technology and functions is the foundation that molding jars to be classified as the same type. The molding jars were used to store materials for buried and gradually indicated the functions of guiding the soul to heaven immortality, protecting future generations, guarding the soul in the tomb. These reflected the tendency of integrating with burial custom and civil beliefs at that time.

Key words: The molding jar, Funerary objects, Function

考古学中一类器物的存在,往往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在汉代至明代不同地域的墓葬中,常可以见到器形为瓶或罐,于器身之上堆塑有各种内容的器物。从使用上来看,此类器物系专门为死者的丧葬活动所制作。“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异于人也”,它们应属于墓葬中明器的范畴,故本文以堆塑瓶(罐)类明器统称之。这些器物形制多样,既各自独立成序,又存在一定联系。“古者明器有形无实,示民不用也”,因此堆塑瓶(罐)类明器有别于一般的生活用器,并不具有实用性。这种“非实用性”证明其存在的意义是供死者灵魂在其身后所处的世界使用,也是当时社会丧葬习俗及民间信仰的反映。本文尝试对堆塑瓶(罐)类明器在丧葬中的多重功用加以研讨,偏颇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堆塑瓶(罐)类明器的概念及范畴

本文所研讨之堆塑瓶(罐)类明器,并不是单纯的一类考古学遗物,而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墓葬中多种随葬器物的统称。所谓堆塑瓶(罐)类明器,是指以瓶或罐为主体,在瓶、罐形器物的器身

上,于颈、肩、腹等部位堆塑有各种造型内容的一类明器,所堆塑内容包括罐状物、角状物、管状物,以及楼阁、亭台、佛像、神仙、人物、日、月、龙、虎、鸟、兽等。堆塑瓶(罐)类明器常见于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所发现汉代至明代的墓葬、窑址之中,足见其符合不同时空范围内各个阶层民众丧葬文化的需要。

本文以堆塑瓶(罐)类明器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将不同时代的器物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讨,而它们在制作技术与基本功用上的一致性是为同一类型进行研究的基础。由于此类明器广为流传,往往因造型或描述角度的差异,使其在不同时代、地域皆有各式各样的称谓,因此首先需要对属于这一范畴的器物加以界定。堆塑瓶(罐)类明器在考古发掘报告或相关论述当中的定名,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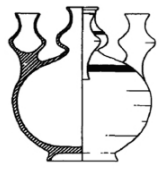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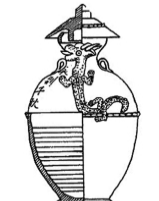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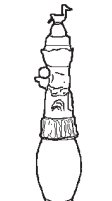
依器物外观来定名。这些名称来源于对器物直观形象的描述,反映其造型或堆塑内容。主要有五联罐、人物堆塑罐、人物楼阁罐、飞鸟楼阁罐、五管瓶、多管瓶、蟠龙瓶、蟠龙罍、多角罐(坛)、牛角坛、盘口瓶、盖瓶、龙虎瓶、日月瓶、堆塑瓶、堆塑长

颈瓶等。

依器物内涵来定名。这些名称来源于器物所隐含的相关信息,与研究者对器物用途的推测有关。主要有谷仓、谷仓罐、多角谷仓、魂亭、魂瓶、魂坛、皈依瓶等。

可见,虽然其中有些名称不同,所记却是同种器物,而有的名称一样,但描述的器物在造型上则存在差异,往往与丧葬习俗、民间信仰相结合,充满地域性。一般来说,本文所述堆塑瓶(罐)类明器主要包括五联罐、魂瓶、多管瓶、多角罐、蟠龙瓶(罍)、龙虎瓶、堆塑瓶、堆塑长颈瓶等多种器物。在此基础上,笔者根据其堆塑内容的不同尝试将其分作两种,即单一内容堆塑瓶(罐)与复合内容堆塑瓶(罐),具体见下表。

表一 堆塑瓶(罐)类明器分类简表

单一内容堆塑瓶(罐)		复合内容堆塑瓶(罐)	
单一罐状内容	 1	罐状复合其他内容	 5
单一角状内容	 2	角状复合其他内容	 6
单一龙、虎状内容	 3	龙、虎、管状复合其他内容	 7
单一管状内容	 4	多重复合内容	 8

1.黎毓馨:《上虞驮山古墓葬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2.周世荣:《湖南出土盘口瓶、罐形瓶和牛角坛的研究》,《考古》1987年第7期;3.柴福有:《浅议浙江江山出土的青瓷堆塑龙瓶》,《南方文物》1996年第2期;4.张文奎:《福建南平市发现宋至明龙泉窑瓷器》,《考古》1990年第12期;5.张志新:《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6.建瓯市博物馆:《福建建瓯市迪口北宋纪年墓》,《考古》1997年第4期;7.朱伯谦:《龙泉窑青瓷》,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7年,图版100;8.郭远谓:《江西南昌朱姑桥元墓》,《考古》1963年第10期。

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制作技术中的共同点命名、以功用界定研究对象,提出堆塑瓶(罐)类明器的概念,以此来代表墓葬中多种基本功用相近的明器,并且选取器物在丧葬中的功用这一视角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堆塑瓶(罐)类明器的功用

本文所研讨的堆塑瓶(罐)类明器,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能够融入不同历史时期的丧葬活动,必然能够在墓葬之中发挥其特有的功用,即储存物品,为魂魄所用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渐显现的引魂升天、保佑后人、镇墓护魂等多元功用。

(一)物质层面功用——储存物品 为魂魄用

粮食为生存之根本,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极为重要,“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而灵魂不灭、事死如生成为当时社会普遍的观念,可谓“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得道身灭耳。”因此古代墓葬中常见储存有粮食的各类器物以及谷仓等特征鲜明的随葬品。堆塑瓶(罐)类明器虽非谷仓,却常被发现于墓葬中用来储存粮食等物品,表现出与此相关的功用。这从其内盛物以及器物铭文两个层面可以得到印证。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堆塑瓶(罐)类明器中的稻谷残留,早自吴晋时期,晚至明代皆有发现。江苏南京吴凤凰三年(274年)墓、福建霞浦吴天纪元年(277年)墓出土的青瓷魂瓶,罐内都保留有炭化稻谷;广东深圳唐墓、东莞北宋墓出土的陶坛内皆残存少量稻谷,均已炭化,呈黑褐色;福建顺昌北宋墓出土瓷多角罐内亦盛有稻谷,出土时稻谷呈黄色,已朽。江西南昌元延祐二年(1315年)墓出土影青堆塑瓶,瓶内盛有稻谷等粮食。湖南芷江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墓出土堆塑罐,装有稻谷,现米粒已无,谷壳呈透明状,保存完好。除了上述已经炭化

的稻谷残存,在江西丰城南宋咸淳八年(1272年)墓出土影青瓷堆塑瓶,瓶内满盛着褐色瘦长稻谷,由于封盖严密,所以谷粒保存完好^①。可见,从整体上看,不同时代都有堆塑瓶(罐)类明器储存粮食的实例发现。

一些堆塑瓶(罐)类明器虽然没有储存粮食,但器身的铭文也说明其与粮食有关。浙江绍兴出土吴永安三年(260年)青瓷魂瓶^②,器身有“飞鹿”、“五种”、“相向”等铭文。所谓“五种”,实为五谷。《周礼》曰:“谷宜五种”,郑玄曰:“五种,黍、稷、菽、麦、稻也。”^③这时的“五种”应代表五种粮食作物。再如《汉书·食货志》云:“种谷必杂五种,以避灾害”,颜师古注曰:“五种即五谷,谓黍、稷、麻、麦、豆也。”^④可见,这件魂瓶器身的“五种”铭文应具有五谷之意,证明此器蕴含与粮食谷物相关的功用。

隋唐之际,在墓葬中始见一种类似于盘口壶的器物——罍瓶。在罍瓶颈、肩处堆塑一条蟠龙即为蟠龙罍,两者在器形方面颇为一致,在功用上也应不尽相同。1979年7月,浙江绍兴文物管理委员会曾收集到一件“四螯壶”,即罍瓶。在该器的腹部刻有:“上虞窑匠人项霸造粮罍瓶一个献上新化亡灵王七郎咸平元年(998年)七月廿日记”^⑤。从铭文中可知,这件器物为“新化亡灵王七郎”所制,是墓葬中的随葬明器,在当时名为“粮罍瓶”,应是与粮食谷物有关的一件器物。而《事物纪原》载:“五谷囊者,起自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恐其魂之饥也,故设五谷囊……今之粮罍,即古重之遗意也。”^⑥更明确指出粮罍相当于古时的“五谷囊”,具有以粮食来随葬,解决魂魄之饥的功用。由此推断,蟠龙罍这类堆塑瓶(罐)类明器也应具备随葬粮食的功用。

浙江龙泉博物馆藏一件北宋多管瓶,肩部等距离堆塑五管,管呈喇叭状,腹部分成六层装饰。器盖做荷包钮,盖内墨书“张氏五娘五谷仓柜上应天宫下应地中荫子益孙长命富贵”二十四字^⑦。说明此器名为“五谷仓柜”,在墓葬中应被当作与谷仓有关的贮藏粮食之用。此外,湖南长沙出土有器身分别刻有“仓廩实”、“东仓、西库”等字样的堆塑瓶(罐)^⑧。(图一)而江西省南昌县博物馆藏一对堆塑长颈瓶,顶部也分别刻划有“东仓”和“西库”字样。^⑨这些铭文同样表明此类器物随葬于墓中,代表储存粮食之用,蕴含着粮食丰收、丰衣足食之意,同时再现了粮谷仓储的安置情况。

可见,墓中随葬粮食,是古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异”的反映,正所谓“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



图一 堆塑瓶(罐)类明器“仓廩实”、“东仓西库”铭文
(引自周世荣:《湖南出土盘口瓶、罐形瓶和牛角坛的研究》,《考古》1987年第7期。)

其馁而”^⑩。这不仅可以使亡者灵魂免受饥饿之苦,过着与生时一样的富足生活。意即“谓死如生,闷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廩。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款精魂”^⑪。还蕴含祈愿亡者在升仙过程中能够利用这些粮食打发前来骚扰、设置阻碍的各类鬼魅。

除了稻谷等粮食作物,堆塑瓶(罐)类明器内还有其他内盛物发现。主要有钱币、布帛、清水等。

福建顺昌北宋双室墓的北室出土两件青瓷堆塑瓶,塑有蟠龙,内装数十枚铜钱,但都已氧化粘结。同室还出一件青瓷多角罐,同样装有数枚氧化的铜钱^⑫。江西永新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刘沆墓出土一件陶多角罐,罐内有铜钱十六枚,疑为穿钱所用的细银条一根^⑬。湖南祁阳黄泥圩镇南宋墓出土一件陶堆塑瓶,内装铜钱六枚。其中“崇宁重宝”五枚,“绍兴通宝”一枚^⑭。除此之外,湖南耒阳出土的宋代堆塑瓶中还盛有纸钱。墓葬中随葬钱币,始自汉代,“会有人盗发孝文园瘞钱。如淳曰:瘞,埋也。埋钱于园陵以送死也”^⑮。除了在墓中随葬真实的流通货币,还有随葬冥钱。徐州东甸子西汉墓出土陶饼57枚,圆形,正面凸起,上饰圆涡纹,形制相同,大小相近,应是模仿金饼而制作的冥钱^⑯。此后还开始随葬纸钱来作为替代品,“汉以来葬者皆有瘞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至是巧乃用之。则是丧祭之焚纸钱,起于汉世之瘞钱也。注云:汉葬者有昏寓钱,谓昏晚埋于圻中,为死者之用,至唐王玙乃于丧祭焚纸钱以代之也。”^⑰在墓中随葬钱币,其用意在于使墓主在死后的世界中继续尽享荣华富贵,也是“事死如事生”思想的表现之一。堆塑瓶(罐)类明器中盛有钱币的实物,大多发现于今两湖

地区宋代墓葬中,且常见于多角罐内,而在其他时期及地域所出土的堆塑瓶(罐)类明器中发现寥寥。由于在长江中下游以南部分地区,“角”与“谷”同音或谐音,故“多角”即寓意“多谷”,是对农业兴旺的祝祷^②。因此笔者推测在器身堆塑有多角,已经包含多谷的寓意,再用来盛钱,随葬物品更为丰厚,可谓赋予其多重功用。

同样在湖南地区出土的堆塑瓶中还有布帛以及残留的清水发现,其中清水是否为酒,已无法验证^③。而在福建地区北宋中晚期墓中,堆塑瓶(罐)类明器上还有“钱库长满”、“酒库大吉”等铭文^④。至于在堆塑瓶(罐)类明器中盛酒,虽然没有实例可以证明,但古代已有用粮食作物来酿酒的传统,如1953年,广州龙生岗东汉初年墓出土的釉陶提桶,器盖内墨书“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的题书,器内还盛有半桶已经炭化的高粱。提桶原为盛酒的器皿,说明当时已用高粱酿酒^⑤。因此,有些标有“酒”含义铭文的器物,很有可能盛放的并非是酒实物,而是用来酿酒的粮食作物,以此代表酒。

由此可见,无论是堆塑瓶(罐)类明器内盛有粮食等物品的确切实例,还是其铭文中体现出的储物属性,都可以证明堆塑瓶(罐)类明器在墓葬中的基本功用为储存物品,包括粮食、钱币、酒等可以满足墓主死后生活需求,为其所用的物品。东汉以后,堆塑瓶(罐)类明器往往与其他储存物品的明器在墓中同时出现。如江苏吴县元康五年(295年)墓与江苏江宁元康七年(297年)墓中青瓷魂瓶皆与青瓷谷仓并出^⑥。从表面看来,这两类功用比较接近的明器在墓葬中重复出现,但实际上一方面体现了古人受当时社会厚葬之风的影响,希望为亡者提供更加丰厚的粮食储备,能够丰衣足食、避邪消灾的美好愿望以及“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符合汉晋时期墓葬随葬品逐渐生活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堆塑瓶(罐)类明器与单纯的谷仓类明器不同,在墓葬中的功用不是单一的,还有通过储存物品这一基本功用衍生出来的其他功用。

(二) 精神层面功用——引魂升天 保佑后人镇墓护魂

堆塑瓶(罐)类明器在墓葬之中的基本功用为储存粮食等物品随葬,这可谓其物质层面的功用。伴随愈发繁复的堆塑内容的出现,其精神层面的功用亦逐渐显现。通过增加、改变堆塑内容,越来越多原本属于其他类明器的功用渐渐集中于堆塑瓶(罐)类明器之上,并体现出与当时社会的丧葬习

俗、民间信仰紧密结合的趋势。

敦煌发现的晚唐写本《杂抄》云:“昔伯夷叔齐兄弟,相让位与周公,见武王伐纣为不义,隐首阳山,耻食周粟,岂不我草乎?夷齐并草不食,遂死于首阳山。载尸还乡时,恐魂灵饥,则设熟食瓶、五谷袋引魂。今葬用之礼。”^⑦这一记载反映了“熟食瓶、五谷袋”还可以用来引魂,体现当时民间在墓中随葬粮食谷物的隐含缘由。古代的埋葬制度与习俗具有双重的目的与性质,即一方面要好好地伺候形魄在地下宫室里继续维持人间的生活,一方面要帮助魂气顺利地升入天界^⑧。正所谓“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⑨。以此来看墓葬中的堆塑瓶(罐)类明器,可推测出随葬的粮食谷物,不仅用来招引死者灵魂进食,防止其饥饿,而且可以发挥器物本身特点,利用汉晋时期丰富的堆塑内容来表现引导灵魂升天成仙的功用。这是对其物质层面基本功用的进一步利用,与古人的灵魂信仰息息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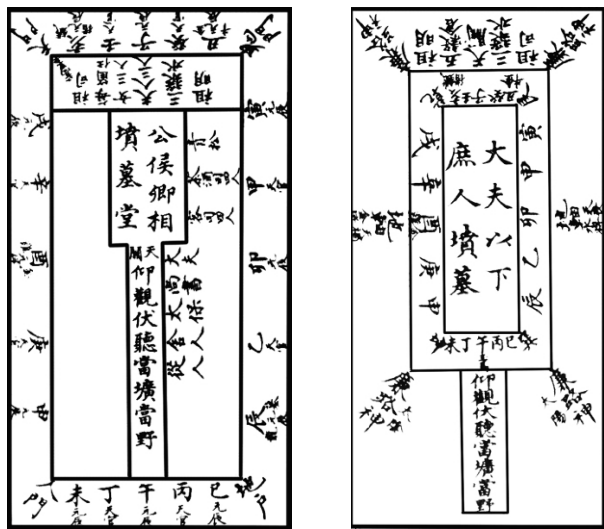
东汉晚期,道教迅速在各地传播开来,并逐渐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墓葬亦受其影响,并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墓门解除、辟邪杀鬼、神药厌镇、长生不死等^⑩。从东吴中期开始,仙人与祥瑞神兽相结合的升仙场景开始出现在魂瓶之上。乘兽神仙、持节神仙、佛像等人物,以及青龙、白虎、朱雀、麒麟、狮子、鹿等瑞兽,成为引领亡魂由墓中前往仙界的象征。如浙江宁波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墓出土一件魂瓶,腹上部印贴有二排堆塑,有仙人骑马、辟邪、羊等^⑪。此外,仙人所骑神兽还有鹿、麒麟、龙等形象。浙江上虞凤凰山西晋时期墓M257出土一件魂瓶,下部堆塑独角麒麟,作飞奔状,仙人肩生双翼^⑫。《太平广记》中描绘仙人下凡的情景时,有“须臾,千乘万骑,悬空而下,皆乘麒麟凤凰,龙鹤天马,人物仪卫数千。持戈戟兵杖。”^⑬可见,堆塑瓶(罐)类明器上堆贴人物所乘的麒麟、龙、马皆为升仙坐骑,而这些人物也应是仙人形象,具有浓厚的神仙祥瑞之义。此外,当时堆塑瓶(罐)类明器上广泛出现的楼阁建筑,不仅是现实生活屋宇楼阁的写照,也应是传说中仙人居所的象征。“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绹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⑭。它们与其他堆塑内容相结合,是各种神仙异士、舞人乐人以及珍奇鸟兽围绕着一座精美天宫,构成一幅灵魂天堂的画面^⑮。总之,这一系列堆塑内容反映了引导死者灵魂升天的场面,通过仙人形象引申出期待亡者“羽

化而登仙”的愿望,意即“为道学仙之人,能先生数寸之毛羽,从地自奋,升楼台之陞,乃可谓升天”^⑫。

这一时期不少魂瓶上还都堆塑有龟趺碑形象,有的甚至塑有两通,碑皆为圭首尖额形状。碑上所刻铭文中常见“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等祈福之语。北宋龙泉窑多管瓶上也有“上应天宫,下应地中,荫子益孙,长命富贵”、“荫益子女孙子富贵长命大吉”^⑬的墨书。这些铭文都反映了在生者想象并营造的一个鬼神世界中,希望亡者灵魂能够平安升仙,并保佑尚在世的子孙平安康健,为后人祈福。堆塑瓶(罐)类明器的功用由单纯为亡者服务扩展到可以保佑生者,体现了中国古代墓葬中生者与亡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期盼亡者来保佑生者,不仅是生者对亡者情感的表达,也使生者的精神得到慰藉,是当时人类对现实世界认知与信仰的体现。

此外,堆塑瓶(罐)类明器在墓葬中精神层面的功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宋代以后的堆塑瓶(罐)类明器,无论是器物造型,还是分布地域,都和前代大相径庭,这与不同时空范围内社会生活、丧葬习俗、民间信仰的差异密切相关。汉、晋时期的五联罐、魂瓶已经开始呈现出通过各式堆塑内容来寄托新功用的特点,此时依然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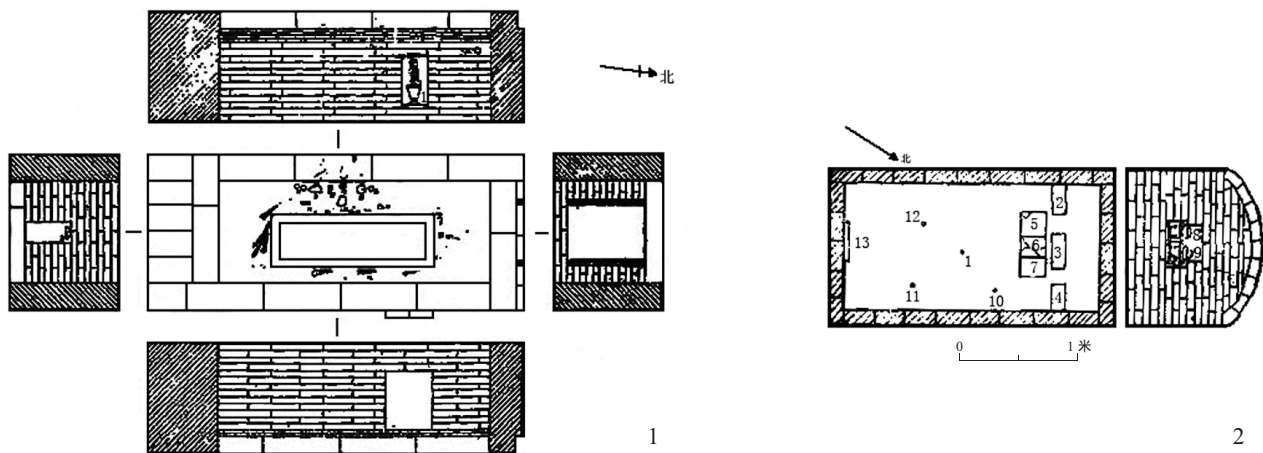
入唐以后,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伴随厚葬之风而开始创立更为严密的丧葬制度。随葬镇墓神兽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从考古发现来看,唐宋墓葬中常见的镇墓神煞类明器主要有镇墓兽、天王俑、武士俑、仰观俑、伏听俑、蒿里老人俑、十二时俑;各类兽首人身俑,如牛首人身俑、马首人身俑、猪首人身俑;人首兽(禽)身俑,如人首鸟身俑、人首龙(蛇)身俑;金鸡、玉犬、铁猪、铁牛等。成书于金元时期的《大汉原陵秘葬经》“明器神煞篇”中,对这些镇墓神煞类明器都有相应的记载^⑭(图二)。北宋中期以后,这些镇墓神煞类明器在墓葬中逐步减少,但这种“消失”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改变,它们开始集中出现在堆塑瓶(罐)类明器之上,成为堆塑内容。可见当时人对于随葬明器有了新的认识,即已从汉唐时期在墓内放置金属或陶瓷的实物或俑类,转为采用各种方式来示意,追求生者对死者观念上的满足,以寄托对死者的追思^⑮。此时的堆塑瓶(罐)类明器也因为所堆塑的镇墓神煞类明器,成为多种明器的复合体,表现出镇墓、以保卫墓主灵魂不受鬼魅侵扰的新功用。



图二 《大汉原陵秘葬经》所记公侯卿相、大夫以下庶人墓中明器位置图

如江西省清江县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墓出土的影青釉瓷堆塑瓶两对。其中女墓所出一对肩部饰“S”状纹饰,上有十三个立俑,颈部饰青龙、白虎、蛇、犬、太阳和螺状云等。男墓所出一对肩上有十二个双手握铜的武士立俑和一个戴幞头的跪拜俑,颈部饰青龙、白虎、龟、蛇、凤、鹤、鸡、犬、鹿、马、太阳、祥云以及女立俑、鹤手执铜的男武士坐俑^⑯。其中这十二个人物俑应为十二时俑,作为十二方位的守护神灵,即十二神的化身,能够驱除鬼魅,全面保卫墓主灵魂。而多出的一个则以伏听俑的形象出现,伏拜而又侧听,应为倾听“地府”动向的神煞俑,在墓中起到陪伴并守卫墓主灵魂不受鬼魅侵害的作用。可见,这些堆塑瓶器身之上所堆塑的图像正是墓葬中曾经独立成型的各种镇墓神煞类明器,在功用上也集其大成,呈现出镇墓功用。但堆塑瓶(罐)类明器并不是取代了这些明器在墓葬中的地位,只是将其在墓葬中的功用集于一身。江西临川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朱济南夫妻合葬墓出土的四件青白瓷堆塑瓶,器身都塑有四灵、十二时俑等,且同墓中还随葬独立的瓷四神俑、十二时俑等^⑰。表现出堆塑瓶(罐)类明器功用的复合多元性。

宋元时期随葬明器的这种变化曾被看作明器使用的衰落,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此后随葬明器的风气并未转变。纸明器的盛行及其特有的纸质特性,使随葬明器于当时皆被焚烧,在今日发现墓葬中已难见其原貌。通过堆塑瓶(罐)类明器的这种新功用,亦可发现随葬镇墓神煞类明器并非真正“衰落”,而是体现出明器使用的新发展——在简化的



图三 堆塑瓶(罐)类明器墓中位置图

1.壁龛:湖北武汉傅家坡宋墓平、剖面图,其中1为堆塑瓶;

2.头龛:湖南芷江垅坪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张荃诰墓平、剖面图,其中8、9为堆塑瓶

同时兼顾多重功用的集约型表现。

除了堆塑瓶(罐)类明器的堆塑内容,从其在墓室中摆放的位置,也可以体现这一新功用。墓室后部应为墓主灵魂休息的场所,将堆塑瓶(罐)类明器置于墓室后部或墓主头部附近,说明其与灵魂观念息息相关。汉晋时期置于此,更多的是表达出引导墓主灵魂早日升仙,保佑后人的意愿。后世亦常见将堆塑瓶(罐)类明器摆放于墓室后壁、头龛或头部附近的实例。如湖南耒阳宋墓中,常见在头龛或者头部附近置魂瓶与多角罐各一^④。这种摆放方式在继续引导灵魂的同时,更希望利用此类明器来驱除鬼魅,近距离的保佑墓主灵魂,进一步印证其具有镇墓的功用(图三)。

综上所述,堆塑瓶(罐)类明器在丧葬中的基本功用为储存粮食等物品,使死者灵魂在身后世界中能够丰衣足食,体现了当时人的灵魂观念。通过随葬物品来吸引亡魂还决定了堆塑瓶(罐)类明器精神层面的功用,即以纷繁复杂的堆塑内容反映神仙瑞兽指引灵魂升天成仙的情景,以铭文祈求造福子孙万代的美好愿望,构成一幅内容多元、含义深刻的景象。同时,堆塑瓶(罐)类明器的功用也并非一成不变。宋代以后,伴随四灵、十二时、仰观、伏听、金鸡、玉犬等镇墓神煞类明器成为堆塑的主要内容,此时的堆塑瓶(罐)类明器成为多种类明器的复合体,在墓葬中又增添了镇墓、保卫墓主灵魂的功用。

“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⑤。通过对墓葬出土堆塑瓶(罐)类明器功用的研究,可知明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单单是墓

葬中的一类随葬器物,而是伴随灵魂观念的产生,以此作为古人沟通所谓“天、地、神”思想的物质载体之一。在墓葬与诸多随葬器物所组成的这—个相对封闭的整体系统之中,对某种特定明器出现的原因及其所蕴含的意义等一些文化层面的思考成为进行深入研究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物,即过去的人们生活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但是考古学决不仅仅是对古物的研究,它是通过对遗迹和遗物的分析,来复原制造和使用这些遗迹和遗物的人们的生活,研究人类的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⑥。因此,以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为依托,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研讨,透过器物来看待当时的社会面貌,并探寻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更为墓葬中的明器研究指明新的方向。

感谢刘毅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悉心指导!

注释:

任继昉纂:《释名汇校》(卷第八·释丧制),第480页,齐鲁书社,2006年。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第六·散不足第二十九),第353页,中华书局,1992年。

陈定荣:《堆塑瓶论》,《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2期;陈定荣:《谷仓罐概述》,《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两文首先将考古发掘所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堆塑瓶”与“谷仓罐”,亦即本文所要研讨之堆塑瓶(罐)类明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展开研究。

刘毅:《瓷明器述略》,《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其中第一部分“从五联罐到皈依瓶”,认为从东汉时期的五联罐

到吴晋谷仓罐,再到宋元皈依瓶,此类器物形式各异,但其基本功用是一致的,反映了不同的时代风貌。

(晋)葛洪撰,王明著:《抱朴子内篇校释》(卷四·金丹),第71页,中华书局,1985年。

(东汉)牟子:《理惑论》,收录于(梁)僧佑撰:《弘明集》卷一,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a.南京市博物馆、江宁县博物馆:《南京市东善桥“凤凰三年”东吴墓》,《文物》1999年第4期;b.黄亦钊:《福建省霞浦县发现三国农具模型》,《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a.杨耀林:《深圳古墓中的稻谷遗存》,《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b.广东省博物馆、东莞市博物馆:《广东东莞北宋墓清理简报》,《考古》1991年第7期;c.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顺昌宋墓》,《考古》1979年第6期。

郭远谓:《江西南昌朱姑桥元墓》,《考古》1963年第10期。

芷江县文物管理所:《湖南芷江垅坪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92年第3期。

⑪ 万良田:《江西丰城县出土宋代稻谷》,《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⑫ 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收录于《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第114页;故宫博物院编:《故宫陶瓷馆》,第95页,图版四十二,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

⑬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第4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⑭ (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1120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⑮ 沈作霖:《介绍一件宋咸平元年粮罌瓶》,《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第197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⑯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粮罌),第478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⑰ 朱伯谦:《龙泉窑青瓷》,第95页,图版56,艺术家出版社,1997年。

⑱、⑲ 周世荣:《湖南出土盘口瓶、罐形瓶和牛角坛的研究》,《考古》1987年第7期。

⑳ 陈定荣:《谷仓罐概述》,《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

㉑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一·宣公元年至四年),第70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㉒ (汉)王充撰,刘盼遂集解:《论衡集解》(卷二十三·薄葬第六十七),第461页,古籍出版社,1957年。

㉓ 顺昌县文管会、顺昌县文化局、顺昌县文化馆:《福建顺昌县北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7年第3期。

㉔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永新北宋刘沆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年第11期。

㉕ 杨仕衡:《湖南祁阳县黄泥坳镇发现宋墓》,《考古》1994年第10期。

㉖ (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第二十九),第2637页,中华书局,1964年。

㉗ 徐州博物馆:《徐州东甸子西汉墓》,《文物》1999年第12期。

㉘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一百九·列传第三十四)王屿传,第4107页,中华书局,1975年。

㉙ 李刚:《识瓷五笺》,《东方博物》第二十六辑,第12页。

㉚ 林忠干:《福建宋墓分期研究》,《考古》1992年第5期。

㉛ 广州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办:《穗港汉墓出土文物》,第10页;第98页,图版30,百奔涛广告有限公司,1983年。

㉜ a.张志新:《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期,第130页;b.南京博物院:《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

㉝、㉞ 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中首先提到这条记载。《杂钞》原件现存法国巴黎图书馆,编号为伯2721。

㉟ 张光直:《古代墓葬的魂魄观念》,《中国文物报》1990年6月28日第三版。

㊱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第二十六·郊特牲第十一),第95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㊲ 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第17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㊳ 林华东、展汝:《宁波慈溪发现西晋纪年墓》,《文物》1980年第10期。

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虞县文物管理所:《浙江上虞凤凰山古墓葬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㊵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第六十一·女仙六·王妙想),第376页,中华书局,1981年。

㊶ (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第1400页,中华书局,1959年。

㊷ 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第328页,三联书店,2005年。

㊸ (汉)王充撰,刘盼遂集解:《论衡集解》(卷七·道虚第二十四),第147页,古籍出版社,1957年。

㊹ 朱伯谦:《龙泉窑青瓷》,第13页,艺术家出版社,1997年。

㊺ 秦大树:《宋元明考古》,第151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㊻ 薛尧:《江西南城、清江和永修的宋墓》,《考古》1965年第11期。

㊼ 陈定荣、徐建昌:《江西临川县宋墓》,《考古》1988年第4期。

㊽ 衡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耒阳城关六朝唐宋墓》,《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

㊾ 张光直:《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考古学专题六讲》,第13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㊿ 王巍:《关于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第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